

第三章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与工农运动的发展

一、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由于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加剧。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令原本就对中共充满戒心的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国民党内部分发生了新的分化。除了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而且国民党内部分左、右派的分裂越来越公开化。这时，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核心人物。当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的蒋介石，即把北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看做是扩大自己的势力、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极好机会，同时也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做是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在北伐战争开始的前夜，蒋介石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对蒋介石以回击。但是苏联顾问团不赞成反击蒋介石，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和解政策。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蒋介石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在会上抛出了旨在削减和降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数量和职位的《整理党务案》，致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这是由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对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尤其是对蒋介石的认识不清和策略上的错误，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曾提出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但却无法实现，也没能阻止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膨胀。国共合作面临破裂，革命形势处于极端复杂的状况中。

中共广东区委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是主张反击的。1926年3月30日发表了《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5月23日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申明共产党人努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谋工农的解放，维护革命联合战线的立场和事实，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揭露新右派分裂革

命势力的阴谋，号召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反革命的分裂活动。广东区委的意见虽然没有被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所接受，但仍然对新右派势力保持着警惕，并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遏制右派势力，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这对全省、对北海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在北海，1926年1月，北海经广东省政府议决设为独立市，并设市政筹备处，首任处长为黄祖培。3月18日，黄祖培宣布就职。6月，驻扎在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奉命参加北伐战争后，由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接驻北海，市政筹备专员职务由陈椿熙接任。随后，北海的政治形势起了微妙的变化，第十师调走后，该师的中共党员随军全部撤离，而进驻北海的第十一师内则是清一色国民党员，其中还有不少是国民党右派。这时，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改组全省各市县党部的决定”，按照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的要求，拟订全省各县市党部改组的时间表，改组内容主要是解除国民党党部中共党员担任的职务，削减共产党员数量，对共产党员实行排斥和清理政策。3月，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改组，解除共产党员江刺横组织部长、简毅工人部长、李雄飞监察委员的职务。另外，省党部委派曾广钰、林培、包天爵、李玉岗、劳达真等加入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并成立“清党委员会”。这时革命和反革命营垒已泾渭分明，北海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

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虽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右倾妥协退让政策，但广大党员和地方组织仍然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活动。1926年12月中旬，黄学增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的名义，在高州主持召开南路农民代表和国民党各市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上，针对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林云陔到南路支持反动势力、排挤共产党人、制造磨擦、挑起事端、镇压农运、破坏国共合作等行径，揭露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分裂阴谋。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进城捣乱，高呼反共口号，黄学增率领与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分裂阴谋。江刺横以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执委的名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与会代表一起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2月底，江刺横和张达超又代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江刺横又与中共党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刘尔崧一起与国民党右派分裂活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后不久，江刺横接到了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函告，要其速回北海“交待”工作。实际上是要解除他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中的职务。这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越来越露骨，国共合作的形势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些同志劝江刺横不要回北海，但他却坚定地说：“就算交出了市党部，但我们还领导着总工会，我的岗位就在北海。”这表达了他坚决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决心。

1927年初，江刺横回到北海，这时北海的统一战线形势已恶化，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已对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和市总工会的革命活动实行限制，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中的共产党

员和左派人士均被解除职务。但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毫不畏惧，仍与市总工会一起，发出“打倒新兴军阀”的口号，张贴标语，矛头直指第十一师。随后，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南路特委的指示，积极组织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和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二、北海人民支援北伐战争与工农运动的发展

北海人民对北伐战争的支援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 10 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因此，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期待转向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1926 年 4 月，华北、华中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7 月 9 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北伐前夕，尽管国共合作已潜伏着新右派搞分裂的危机，但还没有表面化，进行北伐仍然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就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要求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北伐战争必经之地，都要预备民众的奋起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要将农民运动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5 月 1 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也都作出决议，指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北伐誓师后，7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广东党组织在工、农、商、学各界团体中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北伐。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上述两个大会的决议，在大力发展工农运动的同时，向工农群众宣传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动员人民从各方面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北海人民节衣缩食，为筹措北伐饷需和筹集北伐经费，作出了重要奉献。当驻北海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奉命出师北伐时，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动员人民大力支前，积极开展宣传、劳军、募捐等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海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全国各地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形势下，北海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倒陈”运动。1926 年 6 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奉命参加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接驻北海，

市政筹备专员由陈椿熙接替黄祖培。8月，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以赴广州就医和赴苏联考察为名离职，由副师长邓世增暂代师长。由于国民党右派感到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已触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此，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虽然国共合作仍在继续，但两党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国民党开始暗中实行“遏共”政策。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也在各地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代理人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椿熙经邓世增的推荐调任北海市政筹备专员，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反对。

陈椿熙到任后开始多方对群众运动实行限制和压制，首先撤去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张达超的妇女部长职务，然后威胁群众运动积极分子。对原来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废除了的苛捐杂税，陈椿熙一概不予承认，而且另外还增加了几项新税种，加大对人民的盘剥，民间怨声载道。在1926年秋北海人民群众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期间，陈椿熙出动警察，殴打拘捕工人，还拒绝市总工会的交涉，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陈椿熙上台后短短的几个月里，贪赃枉法，劣迹昭彰，让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清醒地意识到，陈椿熙已赤裸裸地成了大革命的对立面、新军阀的代表，与他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营垒的斗争，不将他打倒，革命就难于发展。于是在全市各界中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倒陈”运动。

1926年11月18日，在北海农工商学31个团体的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发起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的运动，请求广东省政府撤销贪官污吏、市政筹备专员陈椿熙的职务。市总工会在列举陈椿熙的罪状檄文中指出：“北海市政筹备专员陈椿熙背宪违法，贪污溺职，当此青天白日之下，实不容此等贪官污吏，应由大会吁请政府撤办。”会上一致认定陈椿熙的十大罪状，并成立“北海市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以北海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名义分别将陈椿熙的罪状电呈国民党中央执委、政治委员会、国民党监察院、广东省政府民政厅等，呼吁“撤办陈椿熙，由北海召开市民会议选举市政委员会组织市政府”、“押追侵吞公款之劣绅”等。会后，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人民有选举罢免权”、“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全市街头巷尾贴满了声讨陈椿熙的布告、标语、檄文，群情激昂。

但陈椿熙面对这种情势，却错误估计了形势，继续与全市人民为敌。从11月18日至26日之间，他不断地派出军警，以扰乱治安为名，胡乱拘捕民众，撕毁标语、布告，更激起民愤。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决心把这一“倒陈”运动进行到底。12月26日，在市总工会号召下，全市一致停业，开始罢工、罢市、罢课，农工商学联合会还叠电省政府，控诉陈椿熙的罪行，陈述停业缘由。电文称：“自市政筹备专员陈椿熙接任后，一切措施与法背离，大拂民意，经该埠团体，电控请撤差查究，该专员以各界故与为难，非常愤恨，连日派警四出胡乱拘捕商民，团体出面调停，均被匡带拘拿，肆行殴辱，致动公愤。该埠农工商联合会及妇女部、女权运动会，昨日叠电省政府报告，谓全市昨已停业，恳迅予解决云。”当天，数万群众举行规模空前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市政筹备处，指名陈椿熙出来答话，但此时陈椿熙已吓得跑到第十一师驻地躲了起来。游行群众又高喊着“打倒陈椿熙”的口号涌向第十一师驻地，将驻地围住，要陈

椿熙出来，但陈椿熙不敢接见群众。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邓世增出面干涉，要群众迅速复业、复工、复课，不要扰乱社会治安，否则以乱民论处。示威群众派出张达超、陈演晖、黄龙耀等代表与邓世增展开辩论，陈述群众的合理要求，驳斥邓世增为陈椿熙的辩护，表示要将“三罢”斗争进行到底，不获胜利决不罢休。与此同时，合浦和涠洲岛人民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市区人民的“倒陈”斗争。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陈椿熙不得不向广东省民政厅提出辞呈。12月29日，广东省政府被迫宣布撤销陈椿熙北海市政筹备专员职务，释放被拘捕的群众，清理税种。同时，省民政厅以1145号委任令，委任周昌荫为北海市政处筹备专员。1927年4月27日，周昌荫因贪污受贿被市民弹劾去职。7月9日，广东省民政厅任命廖国彦任市政专员。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发动和领导北海人民取得了“倒陈”斗争的胜利，“倒陈”运动形成了大革命期间北海革命运动的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三、大革命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工农反蒋武装暴动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但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这就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当蒋介石反革命势力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日益膨胀，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后，蒋介石反共和反工农运动的面目越来越公开暴露，革命联合战线面临着破裂的危险。这时，中共中央对广东区委关于准备力量应付突然事变正确意见，却斥之为“是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并限令“必须坚决纠正”^[1]。为了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更着重批评所谓“党内的‘左’倾”，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做法夸大成主要危险，从而掩盖了国民党新右派准备叛变革命这个根本危险。会议提出的挽救危机的政策措施，其中心思想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的‘左’倾”，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就压制了热火朝天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给在逆境中奋斗的地方党组织更增加困难。党中央指导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后果。

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加紧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诬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主张立即以

暴力手段“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1927年4月12日，李济深从上海回到广州，作出“清党”部署。中共广东区委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的阴谋有所警惕，于4月上旬就作出决定，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反抗蒋介石、李济深的压迫。全省总起义日期定于5月初。然而派往各地的专员，除北江外，均未及出发，李济深于4月15日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大肆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左派积极分子，仅7天被捕者即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四一五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南路各县公开反共，他们成立了以反动头子林云陔为首的“南路清党委员会”。从4月16日开始，在南路的阳江、高州、化州、电白、信宜、北海等地袭击工会、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领袖。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突然袭击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3]。4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及工农青妇等团体联合发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号召“全省工农革命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刽子手”^[4]。”接着，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对南路各市县工农运动的领导，在高州成立了中共南路地方委员会，书记黄学增，副书记王克欧，委员韩盈、钟竹筠、梁木荣等。随后，南路各县市中共地方组织相继被破坏，党组织主要成员遭杀害。4月底，韩盈在遂溪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5月初，梁木荣在阳江被捕。这时，南路各县市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南路地委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及时撤出高州城，转移到广州湾（今湛江市）。中共南路党团组织在与上级联系中断、地委书记黄学增赴广州未归、许多领导人惨遭杀害的情况下，在广州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上旬召开南路各县农民代表会议，研究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斗争。

5月上旬，在南路地区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受到严重摧毁的情况下，中共茂名县（今高州）支部书记朱也赤、吴川县支部书记陈信材和遂溪县党组织负责人黄广渊等，在广州湾主持召开南路15县的农民代表会议，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推举朱也赤为主任，陈信材为副主任。会议还决定与会代表分赴各县，集结力量，发动武装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

会议结束后，黄广渊到遂溪、海康交界的乐民镇同隐蔽的共产党员黄斌、陈光礼、陈炳森、刘坚、薛文藻等一起，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5月14日，遂溪县第六区反动区长潘林雄带领7名警兵到乐民镇附近的海山新圩仔勒索群众，与农民发生争执。圩上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进行干涉，反被潘林雄借口检查枪证缴去枪枝。海山村农军闻讯后，黄广渊、黄凌氏（黄广渊之母）、陈光礼等率领农军200多人包围新圩仔，活捉了潘林雄和7名警兵。接着，农军占领了乐民镇。与此同时，遂溪、海康党组织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攻占县城。

乐民、海山武装暴动震动了遂溪、海康两县，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欲加镇压。5月18日，国民党遂溪县县长林应礼、海康县县长谢莲航亲率县警队，会同国民党三十一军两个连共1000多人，直扑乐民地区，包围了海山村。黄广渊等率领农军奋勇抗击，击退敌人多次的进攻。5月21日，林应礼、谢莲航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北海警备司令部，要求速派兵增援，企图一举消灭农军。与此同时，国民党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发布通缉令，悬赏缉捕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208人，黄学增、朱也赤、王克欧等被开除出国民党。5月底，中共遂溪县委在杨柑村秘密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被林应礼察觉，派兵包围，县委主要成员和出席会议的代表10多人被捕，惨遭杀害。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6月下旬，农军在海山村举行誓师大会，宣布举行乐民、海山农民武装起义，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会上推举黄广渊为农军总指挥，陈光礼为农军副总指挥。6月25日，黄广渊率领一部分农军袭击了江洪港，打败了江洪民团缉私队和鸦片公司、洋杂公司的反动武装。6月27日，农军攻克纪家民团局。6月28日，农军围攻江洪的反动据点烟仔楼，后遇敌人援兵被迫退守乐民镇。6月29日，国民党反动军队1000多人，进攻乐民镇。农军据城固守，与敌人激战3个昼夜，因弹药缺乏，兵力薄弱，撤出乐民镇。这次战斗农军伤亡惨重，500人的农军队伍只剩下200多人，200多名农军战士英勇牺牲。从乐民镇撤出的农军转移到农村，坚持斗争。

为了声援和配合遂溪乐民、海山农军起义，南路地区各县市中共地方组织先后在廉江、海康、吴川、信宜等地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在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起义农军普遍抱着“拼命主义”，隋绪，与敌人硬打硬拼，希望能以此夺取中心城市，推进革命进程。因此，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面对强大敌人的镇压，各地农民武装起义都先后失败，损失惨重。

南路人民的武装暴动尽管带有革命低潮时期的不成熟的特点，但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革命群众。其次，保存了革命力量，锻炼了工农武装，为以后南路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再次，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经验。

北海四二三事变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广东区委、中共南路地委关于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面对形势的剧变，积极做着应变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捕共产党人，扼杀革命力量的阴谋，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绑架并软禁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代师长邓世增，迫使其军队交出武器。同时策反驻军一连，充实革命武装，由工会布置秘密赶制大刀等武器，准备实行武装暴动。1927年4月中旬，南路地委通知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在5月前赶到广州湾开会研究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策。但是，正当北海党组织负责人江刺横准备动身赴广州湾时，国民党北海当局探知消息，先向共产党人下毒手。4月23日凌晨，大批国民党军警分别封锁街道、码头，同时突然包围市总工会所在地三婆庙和党的秘密联络点肖我照相馆等处，逮捕了江刺横和潘国鼎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接着在全城实行戒严，逐户搜查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总工会负责人钟辉廉被捕。至4月24日早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主要成员江刺横、李雄飞、潘铁汉、潘国鼎、钟辉廉、冯慕周、冯五其等7人被捕（简毅、苏其礼于事变前已离开北海），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遭到破坏，北海党组织的暴动计划未及付诸实施。被通缉的国民党左派积极分子纷纷逃离家园，农会会员销毁或藏起了会员证。北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即被镇压下去，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北海发动的四二三事变。

从4月23日至5月3日，国民党军警对被逮捕的同志进行严刑逼供和威胁利诱，妄图要他们出卖党的利益，但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对江刺横，敌人设宴由其同族兄长劝诱，并以官爵来拉拢他，而江刺横却踢翻敌人宴席，并怒斥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在狱中，他从容地给党组织写了一封充满革命豪情的绝笔信。信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愿将碧血溅黄花。”“虎狼未除，民不安生，难以成眠，愿同志们齐奋起，革命得胜，死者欢欣。”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耿耿情怀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对潘国鼎，因为其父亲是北海颇具名气的实业家，国民党想从中敲诈一笔，于是要其母亲出二千大洋赎人，潘国鼎知道后劝其母亲不要上当受骗。

钟辉廉则戏谑敌人审判员，敌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钟辉廉答：“我叫中国人。”敌人又问：“你多少岁？”钟辉廉答：“中国共产党万岁！”气得敌人无计可施。

潘铁汉也表现出铮铮铁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知道形势紧张，取下悬挂在总工会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封好后交给亲属，反复叮嘱道：“不要拆开，但要用生命去保护他。”临刑前，他刮净胡子，整容理装，从容赴刑场。

北海四二三事变后，北海工人群众在得知工会积极分子被捕都异常气愤，曾密谋营救，并准备劫持法场。5月3日，国民党当局却改变在西炮台刑场行刑的惯例，将江刺横、李雄飞、潘铁汉、钟辉廉、潘国鼎、冯五其、冯慕周等8人押往审判厅附近的牛车沟（现海滨公园内），

匆匆地将被捕的同志杀害。临刑前，赴难的同志高呼口号，从容就义。这些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光辉旗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共南路地委书记黄学增闻讯江刺横等遇难后，沉痛地说：“江同志明知形势紧张，仍坚持工作，斗争到底，不愧为一个无产阶级伟大的烈士^[5]。”至此，大革命运动在北海遭到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们纠合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由于在北京尚有张作霖控制的军阀政府存在，中国一时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这时，到武汉不久的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汪精卫与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骨子里是反共的，他们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北伐讨奉系张作霖，同时在窥测时机反共，叛变革命。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局面的种种阴谋，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而陈独秀等人对汪精卫等人寄予很大希望，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拿不出纠正这种错误的办法来。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深远的意义。大革命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

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尽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新的复兴之路。

就北海而言，虽然大革命的失败使北海党组织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大革命运动在北海仍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在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共北海地方组织从开展宣传、扩大组织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大大提高了领导能力，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使幼年的党在斗争中经受了教育和锻炼。其次，推翻了军阀邓本殷、申葆藩在北海的反动专制统治以及打倒了贪官污吏陈椿熙，最广泛地发动了工农群众，极大地启发了他们的革命觉悟，使工人、农民、学生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共产党的主张和影响已经在群众中生根，奠定了革命的群众基础，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有所提高。再次，大革命运动的空前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为今后的革命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北海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在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又踏上了新的斗争征途。

[1] 《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

[2][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60页。

[4] 《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第92页。

[5] 参见《林丛郁（林增华）回忆录》。